

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壓倒 集體主義經濟理念以後

——為紀念一代宗師海耶克逝世而作

• 邢慕寰

一 馬克思是近代歷史演進 的先知嗎？

自十八世紀下半期資本主義制度逐漸由雛形蛻變為現代形式時起，亞丹·史密斯(Adam Smith)以下的偉大思想史家對資本主義面臨的一些嚴重問題即已表示憂慮，甚至對其未來也抱持高度懷疑。例如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和李嘉圖(David Ricardo)都曾對人口遞增報酬遞減的現象提出預警；而馬爾薩斯並擔心儲蓄過度引起有效需求不足，以致市場滯銷工人失業；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尤其關心分配不均的後果，明白顯示以社會主義政策修正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的傾向。

對資本主義最不信任的，自然是社會主義者。但是在這些人之中，沒有一個像共產主義——科學的社會主義——創導人馬克思(Karl Marx)那樣肯定資本主義制度的階級矛盾終將導致其本身的毀滅，而為共產主義制度所取代。

然而，正如許多觀察家密切注意而為馬克思主義者極力辯解的一項重要事實所顯示，早於1917年共產制度代替舊有制度的國家，不是當時資本主義發展已經相當成熟，而且並未因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而在政策上有所修正的英國，而是由沙皇統治的遠較落後的封建俄國；而且沙俄的解體，並不是由於甚麼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的階級矛盾的自然演變，而是由馬克思主義者列寧等人有組織的自外而內挑起農奴礦工與地主礦主之間的仇恨（雖然這樣的仇恨原來已經存在），然後把他們武裝起來，以推翻沙俄政權。更具體的說，1917年俄國發生的無產階級革命，完全是由馬克思主義者依其先入的意識形態所導演的——其過程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蘇聯和當地馬克思主義者有計劃的策動東歐和亞洲南美的共產革命一樣。所以，如果把馬克思作為一個思想家看待，他關於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終必導致自身毀滅的預言，決不能算是先知。

共產主義制度，是否就是人類社會演進最後的和最完美的形式。不論是由於巧合還是由於某種必然，這個印證現在已經有了肯定的結論。

然而我們感覺興趣的，卻不是這個預言靈驗與否的爭論，而是關於馬克思另一個預言的印證——即馬克思設想的取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共產主義制度，是否就是人類社會演進最後的和最完美的形式。不論是由於巧合還是由於某種必然，這個印證現在已經有了肯定的結論。1917年馬克思主義者依其先入意識形態所建立的工人祖國——蘇維埃聯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口氣依同一模式塑造了東歐共產集團，以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抗；想不到她在渡過七十年風光歲月之後，竟隨同東歐共產國家「風掃殘葉」似的崩潰，成為支離破碎而傾向於資本主義的「獨立國家聯合體」；而剩下的亞洲及南美的幾個共產國家，現在也都汲汲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手段，以抗拒蘇聯和東歐共產國家崩潰以後可能引發的「骨牌效應」。無論現存的馬克思主義者如何辯解，馬克思肯定共產制度就是人類社會演變最後和最完美的形式的預言，正如他肯定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終必導致其本身的毀滅而為共產主義制度所取代的預言一樣，也是徹頭徹尾的失敗了。

二 海耶克預見的集體計劃經濟的後果

這一次關乎人類命運的偉大實驗的失敗，其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已為一些被馬克思主義者斥為反動的思想家——特別是經濟學家——所預見。我在這裏要特別介紹的，是在1992年3月23日逝世的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觀點。海耶克著作等身，其中涉及共產主義與資本主

義的評論亦難一一加以介紹。我在這裏只想簡介其中的兩件著作，即(1) 1935年由海耶克主編出版的《集體經濟計劃》(*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London)中一篇總結性的論文〈關於集體經濟計劃辯論的現狀〉(中譯附錄於本文作者撰寫的《通俗經濟講話》，台北三民書局，1986年)；(2) 1944年出版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殷海光中文節譯本，台北文星出版社，1953年)。

前一篇論文的着眼點，是馬克思主義者建立共產社會的主要支柱——集體經濟計劃。在這篇論文中，海耶克首先指出蘇聯實行計劃經濟十五年(1918-1933)的經驗，是反覆多變的採行武斷而不相關聯的決定，以致1933年俄國大眾的生活狀況猶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經過這一段時間的教訓以後，儘管馬克思主義者以前一直輕視計劃經濟所受到的理性批判，現在則很少人否認，在保留消費者選擇自由和職業選擇自由的社會，尤其是在複雜生活情況之下，所有經濟決定由中央武斷指令在理性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們仍然企圖證明「在原則上」可能仍有解決方法。因此海耶克對一些可能想到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設計進行有系統的檢討。

這些設計包括：(1) 數學方式的解決：在完全掌握一切有關資料之假定下，各種等待生產的商品價值與數量，可應用數理經濟學中競爭的價格形成和生產方向的分析工具加以解決。(2) 放棄消費者主權的競爭：擬定計劃時，可撇開不可預測的重要變數之一的消費者嗜好變動，而由中央計劃當局依其對全社會成員的價值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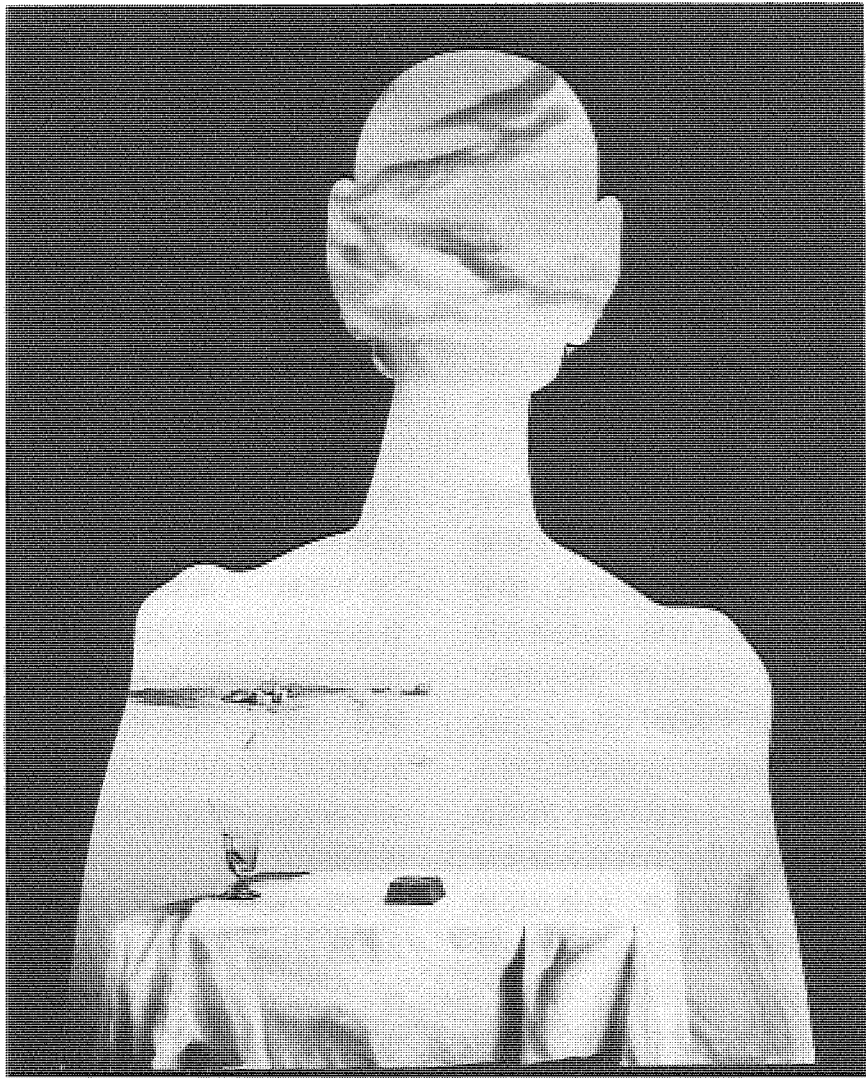
估，決定各種需要的順序；其餘的決定，則通過競爭的方式。(3) 模擬的競爭：在獨立自主的企業或各別廠商的經理（均非其所用生產工具的所有者）之間創造競爭條件，但各種產品（包括中間品及製成品）的售價必須訂在僅够成本而不賺錢的高度，或根據邊際成本的標準。(4) 眾多的獨佔產業相互競爭：將各類產業分別合併為獨佔的產業，然後由這些獨佔者照中央指令競爭消費者的光顧和生產要素的僱用。(5) 真正競爭的社會主義制度：各別企業之間的資源分配，最初可依據過去的產業結構，或對後者即行加以調整；至於經理人員的選擇，則基於某種效率測驗以及過去的經驗。在這個基礎上，各別企業之間及其內部展開競爭。除此以外，海耶克也曾提到擬定計劃時為防止在競爭情況下可能導致資源浪費、以達成經濟「合理化」的構想。但是這個構想可容納於(5)之內，故不另列。

關於上述各種設計的構想，海耶克根據理性的分析和實際的考量一一加以檢討與質疑。這些討論，對一般讀者可能太過專門，所以我在這裏不擬加以陳述。我所要做的，只是對海耶克關於假借「競爭的解決方法」推行社會主義的意義及其困難作一個總結。這個總結，實際上是對社會主義者試圖假借「競爭的解決方法」的死亡宣判。用海耶克自己的話說：「那些曾經慎重研究過社會主義所涉及的經濟問題的社會主義者，現在已經放棄對指令式的中央經濟計劃的信念，而寄望於雖然取消了私有財產還能維持競爭的可能性。」他接着說：「這的確是頭等重大的事：原來對計劃經濟的生產力高於混亂競爭制度所寄託的希望，現在要被社會主義制度在生產力

方面略與資本主義制度相等的希望所代替；原來對所得分配的決定完全與服務價格無關，而一本公正平均原則的希望，現在也要被可能用一部分有形生產要素所得以補助勞動所得的希望所代替；原來對工資制度即將取消、以及社會主義化的產業或企業的經理人員將遵循完全不同於唯利是圖的資本家所遵循的原則的預期，現在也證明是同樣錯誤。」然而，更不幸的是，雖然社會主義者準備付出這麼高的代價以換取資本主義的效率，但「至今尚無一人能夠證明，計劃與競爭如何合理的結合起來」，可以同時得到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優點。實際上，這就是共產國家中央計劃當局不得不採取武斷而不相關聯的經濟計劃的理由，也就是共產國家經濟退化的理由。所以海耶克最後語重心長的說：現在「我們至少必須承認，過去五十年間的思想一直走錯了路，一直受一個仔細檢討後才知道不能實現的觀念的吸引。……不過如果我們關於代表現今主要思潮之一的信念的評價是反面的，我們也沒有感到高興的理由。在一個傾向於計劃的世界裏面，沒有一件事比證明堅持這個路線終將不可避免的導致經濟退化更為可悲。」

眼前最可悲的，莫過於長久以來實行非理性的集體計劃經濟以致付出不堪負荷的沉重代價之後、終於完全解體的蘇聯及東歐共產集團。現在蘇聯已經分裂為十餘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東歐共產國家亦已重新組合，一致以十分艱苦的步伐朝着馬克思主義者原來準備埋葬的資本主義制度「轉進」。在這個轉變過程中，這些國家不僅要以從前視為混亂無序的自由市場代替原來秩序井然的集體計劃經

雖然社會主義者準備付出這麼高的代價以換取資本主義的效率，但「至今尚無一人能夠證明，計劃與競爭如何合理的結合起來」，可以同時得到（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優點。



計劃經濟導致的不但是資本主義的終結，也是個人自由的終結。

濟，而且還要放棄「無產階級專政」，以換取從前斥之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其所以必須如此，是因為經濟自由與政治民主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孿生兒，二者密不可分。而這個理念之所以獲得大眾的接受與支持，完全是由於數十年來他們親身體驗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那些當權的馬克思主義者挾持其僵化的意識形態統治廣大無產階級的群眾，使之遵循集體經濟計劃的指令，機械的各自進行被分派的工作，同時也毫無選擇的各自接受被分派的口糧和基本生活用品。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自然不能充分發揮體能、心智與潛力。坦白的說，除了冠冕堂皇的名詞以外，這些無產

階級的勞動者在實質上與封建制度下采邑或莊園中的奴隸沒有太大的差別。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者能於1917年號召當時的農奴與礦工推翻沙皇政權，從而建立並鞏固共產政權，實非偶然。因為那時無產階級群眾雖然在實質上也是共產政權的奴隸，但是當權者卻把他們捧作國家的主人，而且對他們提出天堂在望的承諾，因而原來就是奴隸的勞動大眾也就心甘情願的接受了。然而經過長達七十年的漫長歲月之後，他們引頸嚮往的「天堂」不但未曾出現，而且一直加在他們心身上的鎖枷卻一點也沒有鬆弛。這就是這些共產國家難以遏阻崩潰的最基本原因。

三 《到奴役之路》—— 對資本主義國家和共產 主義國家的共同警告

以上的討論，引導我們走向前面提到的海耶克另一本著作《到奴役之路》。海耶克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原是向資本主義國家提出警告，以免走上社會主義「奴役之路」。自1930年代經濟大恐慌時起，資本主義國家也明白顯示中央計劃的傾向；同時海耶克一直注意中歐地區在法西斯鐵腕統治之下奴隸化持續進展的實況，因而相信那樣無情的發展過程頗似內在的規律：一旦政府對市場機制的干涉超過了一定限度，除了進一步由上而下加強管制以外，別無其他選擇。他雖然並不認為每一項政府行動都會帶來必然自行擴散的種籽，同時他對政府着眼於福利考量、矯正顯著不公正的權力平衡或抑制經濟衰退等的某些干涉也表贊同，但是他對政府直接控制經濟活動的後果卻深感畏懼。因為這種有計劃的干涉，具有不能遏止的傾向。一旦開始了行動，內在的必要就會迫着它不斷擴張。這種必然性，並非出於計劃者的個人動機——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他們也是一樣。這是因為計劃者並非一開始就要控制全面經濟活動；他們開始所要做的，只不過是就全國經濟的少數部門加以規劃。問題在於僅僅規劃全國經濟的一部分並非如此簡單。事實上，這種工作正如試圖依一條直線步行通過擁擠人群一樣的困難。無論計劃者如何小心，無論設計如何周詳，總不免有些意想不到的事發生。如果這一項計劃涉及全國經濟的主要部門，則在計劃當局為防止意外事件發生時可能危及這些部門乃至全國經濟的考慮下，為

使其管制機能順利進行，他們只得將原定的局部計劃加以擴充，最後甚至可能包括全國經濟中所有鬆散部分在內。

例如英國一度為着達成國營煤礦的計劃產量，必須引進勞工徵募計劃；而為達到後一計劃的目的，就必須訂定一個配合的工資計劃；同時為着使採煤礦的工資對其他工資保持適當的超距，全國薪資結構也都受到牽連。就這樣，開始不過是涉及一項生產的計劃，終於變成一個牽涉廣大範圍的計劃——結果正如通過擁擠人群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命令人群擺成一條直線一樣，要使一個計劃能夠實現，最簡便的方法就是指令其必能實現。

海耶克所擔心的後果是，這樣的計劃終將無可改變的導致列寧所謂的「誰管誰」(Who Whom)的問題：即誰替誰計劃？誰發號司令，決定分配甚麼給誰？果如此，其結果不但是宣佈資本主義的終結，也是同時宣佈個人自由的終結。

以上就是海耶克在其所著《到奴役之路》一書中所表明的主要論點。(關於海耶克在其所著《到奴役之路》中所表達的論點以及與之有關的思想家對資本主義前途的綜合觀察，可參閱Robert L. Heilbroner, *The Worldly Philosophers*,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1953, Ch. X.)由1950年代初年以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實際經驗(包括因應調整的影響)印證，這些論點雖然顯得過分誇張，以致引起所謂自由主義者(liberals)的強烈批評；但對前蘇聯及東歐共產集團而言，這些論點又一次判決了它們終必崩潰的命運。在長期實行集體計劃經濟的體制下，這些共產國家的人民實際上早

一旦政府對市場機制的干涉超過了一定限度，除了進一步由上而下加強管制以外，別無其他選擇。

計劃經濟終將無可改變的導致列寧所謂的「誰管誰」的問題，其結果不但是宣佈資本主義的終結，也是同時宣佈個人自由的終結。

已成為海耶克心目中的奴隸，其生產力與生活水準的低落以及由此導致的共產政權的崩潰，也就不足為怪了。

四 人類社會發展前景的進一步探索

我個人認為，由現在看未來，上面簡介的海耶克的兩份著作，對蘇聯及東歐共產集團解體後的新國家，以及目前仍在力圖維持現制的亞洲及南美共產國家的命運，仍具有無比重要的啟示作用。這些國家現在都在摸索新的道路：它們雖然在經濟方面都傾向於改革開放，但是在不同的程度上仍然受到許多限制——例如財產權私有的禁忌、公營企業體制的僵化，以及刻意保留的或慣性的中央干涉，在在都使自由市場的機制受到窒礙。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的保守勢力仍然非常強大。保守派一方面阻撓改革開放的步調，另一方面利用改革開放所顯露的缺點製造反制的機會。即今就比較開明的改革派而言，他們也顯示很大的差別。有些改革派雖然衷心嚮往自由民主，但是為着突破經濟改革所遭遇的阻力，卻不得不訴求過渡時期的擴權，以致反而引起保守派的攻擊。在另一方面，有些改革派則明白宣示借助於資本主義的方法進行經濟改革，以維護社會主義制度於不墜；但是他們又不能保證放手做下去決不會掉進「和平演變」的漩渦，因而也不免受到保守派的掣肘。

看來蘇聯及東歐共產集團解體後的新國家，以及目前仍在力圖維持現制的亞洲及南美共產國家，現在都面臨不同程度的困難：要退回原狀或保持單一世界（共產制度）固不可能，要兼取兩個世界（共產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優點更不容易。我不是一個

預言家，不過我隱約可以看出：在走過一段漫長的坎坷路之後，這些國家可能終於悟出鄧小平的「白貓黑貓論」同樣適用於政治體制的評判；不過它們將來在政治體制上被迫選取的，可能既不是白貓，也不是黑貓，而是大眾比較喜愛的黑白相間、深淺不一的灰貓——就像戈巴卓夫所欣賞的挪威那樣——資本主義兼含社會主義色彩的混合制度。雖然這個發展不是社會主義的執着反對者海耶克所願見的，但是像挪威所採取的那種混合制度，事實上正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以及邁向自由民主的新興發展國家分別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紛陳雜現。由於這是各國人民各自根據利害得失的考量，通過定期公共投票所做的自由選擇，似乎也並不過於違背海耶克的意願——無論如何，各國人民肯定不會因此走向「奴役之路」。在海耶克於1992年3月逝世時，也許他對這個可能的發展方向感到些許無奈的安慰吧。

邢慕寰 為我國傑出的前輩經濟學家、教育家、實行家，對整體經濟關係、國民所得量度的研究、台灣國民會計系統的建立與經濟政策的制訂，以及港台兩地的經濟教研發展都曾作出卓越貢獻。邢教授1942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其後多次赴芝加哥、哈佛、耶魯等大學深造、訪問。自六十年代開始，先後出任台灣大學經濟學教授，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創所所長（前後凡十年），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院院長等職務，以迄1983年退休。邢教授於1966年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83年獲頒香港中文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目前仍擔任多種顧問職位。

共產集團解體後的新國家以及力圖維持現制的共產國家要退回原始或保持單一世界固不可能，要兼取兩個世界的優點更不容易。這些國家可能終於選取的是像挪威那樣資本主義兼含社會主義色彩的混合制度。